



【生活直击】

餐馆的细节

□肖复兴

在美国的餐馆里，无论大小，无论中餐西餐，客人入座之后，如果是带着小孩来的，服务员拿着笔、本前来请客人点餐的时候，同时会拿来一小盒蜡笔和一张纸。蜡笔一般只是四色，顶多六色，纸是白纸或纸上印有黑色线条的图案，让孩子用蜡笔在上面填空涂颜色。如果来的是两个或更多的孩子，他们会多拿来几盒蜡笔和几张纸，分给每个孩子一份。这些蜡笔和纸张是免费的，你用完餐之后，可以随身带走。这几乎成了很多餐馆约定俗成的规矩，就像必备餐巾纸一样习以为常。

前不久，我们在圣路易斯市一家德国餐馆吃饭，正赶上星期天，客人很多，服务员忙得脚不沾地，一时忘记了给孩子拿蜡笔和纸。开始，我还以为这家餐馆没有这项服务呢。两个孩子已经习惯了进餐馆就等着蜡笔和纸张，可以随手画画，打发等餐的时间。餐桌上没有这两样玩意儿，一下子像是少了碗碟刀叉和调料瓶一样，显得桌上空荡荡的，两个孩子有点坐不住了。我忙叫来服务员，指着身边毛了爪儿的两个孩子，问有没有蜡笔和纸张。服务员连声道歉，转身拿来了蜡笔和纸张。

餐馆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孩子不忘画画或抓紧时间随时随地学习，而是在等候上菜之前的这段时间里，让孩子手里有个抓挠，别猴子屁股坐不住，到处乱跑、捣乱。

我国的餐馆里，我没有见过有这样的服务。其实，蜡笔和纸张，成本不高，却让孩子在等餐时可以玩，让家长多了一种体贴的温馨之感。我们的餐馆常会高悬“宾至如归”的匾额，却往往忽略了投入小收益大这样一点。不是舍不得，是想不到。所以想不到，是我们更愿意想那些宏观的大的方面，容易忽略这样小小不然的点滴之处。却往往是这样的细枝末节，润物无声，最见工夫。

在圣路易斯德国餐馆的经历，让我想起前两年孩子来北京的时候在北京餐馆的一段经历。

那时，我常常带他们去一家上海风味的餐馆。餐桌上，摆着一个小方盒，盒子里放着一叠7厘米宽14厘米长的浅褐色的小纸条和一支铅笔。这是供客人用来填写要点的菜品的，纸条的一面印着很多小格，让客人填写座号、菜品的编号和需求的数量。

可能是之前习惯了美国餐馆里的蜡笔和纸张，让孩子习惯于

为这就是给他们画画用的纸笔，两个孩子，一个人从一个方盒里拿出一张纸、一支笔，就在纸的背面开始画画。这纸条太小，哪里是够他们施展拳脚的天地？不一会儿工夫，他们就方盒中抽出了一张又一张的纸条，在上面龙飞凤舞。本来盛放着厚厚一叠纸条的方盒，很快像渗水池一样水流所剩无几。

服务员走了过来，先是看看孩子趴在桌子上画画，发现了画画的用纸，再一看方盒中的纸条愈来愈少，二话没说，探身上前，猿猴轻舒长臂一样，将两个孩子身边两张桌子上的方盒都拿走了。

没有画画的纸了，哥哥先大声哭了起来，叫道：他们不让我画画！那时，弟弟还小，愣愣地瞅着哥哥，不知如何是好。

邻座的客人纷纷侧目，不知道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赶紧起身，从别的桌上的方盒里取出纸条，给小哥俩送来，哥哥才不哭了，接着在纸上画，一直到饭菜送来。

下一次，再来到这家餐馆吃饭，小哥俩记吃不记打，又习惯性地从那小方盒中取出纸笔画画。为防止上次的哭声重现，不让服务员把纸条拿走，我“老奸巨猾”地对哥哥说：你先画张画，送给那个服务员阿姨！那时，他刚学会画熊猫，便在纸条上画了一只熊猫，等服务员过来时，送给了她。服务员一看，很高兴，对他说：画得真好！又问他：你几岁呀？他告诉人家：五岁半！

孩子得到了夸奖，服务员得到了尊重，彼此相安无事，再无人查岗一般来查看方盒中的纸条是否在迅速减少。

那年夏天，孩子回美国之前，从他在那个餐馆里用铅笔画的画中，奶奶挑出了两张，一张是柳树枝条上升起一个大大的红太阳，一张是一头大肥羊的身上飞着一只小鸟。奶奶对他说：这两张画得好，你涂上颜色，我替你粘在你的画本上，算是你这次来北京的纪念，好不好？

孩子用彩色铅笔在画上涂上了颜色，浅褐色的背景，衬托着彩色铅笔的痕迹，还有点仿旧的效果呢。

如今，重看这两幅画，觉得很有意思。有意思不是在于他画得好，而是在于两个国家的餐馆里关于小孩子画画的不同经历与不同感悟和不同的纪念。

【文坛旧事】

那晚，他们没见面

□张梦阳

1924年10月，主编《晨报副刊》的孙伏园因为鲁迅的《我的失恋》被撤下，愤而辞职。不久，《京报》主人邵飘萍先生听说孙伏园离开《晨报》了，就请他到《京报》创办一个副刊。

1924年12月8日，《京报副刊》即在孙伏园主持下与读者见面了。此后，《京报》的读者一天比一天多，最多的一天增加了两千份以上的订户，印刷所加班，送报的加人。邵飘萍一次对荆有麟讲：印刷工人和发行部的人竟发出怨言，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从中可以看出，《京报副刊》影响大了。而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是广大青年要看鲁迅的文章，因而纷纷订阅《京报》。鲁迅先生也没有使青年人失望，自《京报副刊》发刊后，对于时事及学术、社会、文艺各方面，都有文章发出。

有鲁迅的热心支持，再加上当时在文艺界很享盛名的周作人等，也都常有文章发表，《京报副刊》便风靡北方，“纸贵洛阳”，孙伏园“副刊大王”称号也叫得更响了。

《晨报》颇受打击，找孙伏园来说和，伏园得意地以胜利者的笑容拒绝了。《晨报》只好请诗人徐志摩来接编。

徐志摩是孙伏园的朋友，所以对他们俩编着几乎可以说是敌对的报纸，却因此减却两人见面的机会。相反，因为志摩也编着副刊，为了拉稿的关系，两人常常碰头。他们经常交换意见，交换批评，甚至交换着旁人对他们所编的副刊的好恶消息。

当时正是徐志摩走向社会活动的时代，每月茶点召集贤

人淑女的新月会议；在北大等校又讲授着英国历史上的诗人——拜伦与济慈；他表扬他的客厅的新诗《石虎胡同七号》，也吸引青年争相拜访。但他却忽然转兴，发表起有关政治的杂文《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孙伏园把这篇杂文拿去给鲁迅先生看，还问了鲁迅的意见。过了几天，志摩又与伏园相见了。从未与鲁迅会过面的志摩问起，他那篇文章，鲁迅先生的意见怎样？

伏园直爽地答：“鲁迅先生说那篇文章写得真好！”

然而，正以诗人身份在文坛上争辉的志摩，感觉到鲁迅是在讽刺他，立刻说：“他骂得我好苦呵！”

伏园立即解释说：“这次鲁迅先生可不是骂，是说真好！”

陈子善先生前段时间发表《鲁迅见过徐志摩吗？》，提出了徐志摩是否与鲁迅见过面的问题。我记得，1921年8月鲁迅在《〈狭的笼〉译者附记》中对泰戈尔赞成“撒提”（寡妇与亡夫一起火葬）提出批评，以及除给《京报副刊》写稿外，还给《语丝》《莽原》《猛进》《国民新报副刊》等报刊写文章，却没有给过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一个字。由此可以判断，1924年5月8日，鲁迅晚上同孙伏园一起以一般观众的身份往协和校园会堂观看新月社祝泰戈尔氏六十四岁诞辰演《契诃夫》脚本二幕，看到过台上的徐志摩。徐志摩这时或在其他场合也看到过鲁迅。而鲁迅虽然赞扬过徐的杂文，政见还是不同，所以演出完毕后，没有上台与徐志摩会面，就半夜回家了。

【社会观察】

慎以惜时论短长

□金新

从教数十载，最耳熟的话，莫过于家长与教师的一句口头禅：“这孩子（学生）不珍惜时间。”确实，不要说普通中学，即便省一级重点，亦不乏浪费时间的现象。于是乎，望子成龙的家长和教师就经常高悬时间这面镜子：齐白石如何垂暮之年发奋绘画不教一日闲过，鲁迅如何把喝咖啡的工夫用在写作上；你却怎样游手好闲做阿混，怎样视时间如粪土……言之凿凿，短长分明，令为子为生者汗颜。

其实，珍惜时间既是个人的素质问题，也是社会的环境问题。君不见重理轻文的风气之下，有多少孩子迫于父母的世俗观念弃文从理，将时间花费在事与愿违的学科里，应试教育的浊浪之中，又有多少学生为了考试分数，疲于毫无意义的机械识记，把时间消磨在“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般的文字游戏中。换言之，由于某种社会大气候的影响，是很难驾驭时间，充当时间的主人的。

人生苦短。沉湎娱乐，不思学业，是对时间的一种无聊消遣；走错方向，勉强为之，则是对时间的一种过失犯罪。当我们的家长同教师高祭

时间的明镜照人之际，不妨反观自我，这样便会发现一个极其简单的事实：白石老人不教一日闲过，是因为他酷爱绘画，以之为生命；迅翁爱惜喝咖啡的时间，是因为他醉心写作，以之为武器。游手好闲，视时间如粪土，那是可叹的；让自己的孩子或学生在有限的生命旅途、无限的知识领域南辕北辙，那是可悲的。

倘若无视他人奋斗的目标，苛求惜时如金，岂不近乎残酷？看来，无论家庭还是学校，给予自觉者以时间的民主使用权，在某种程度上比给予不自觉者以时间的警告，似显得更加重要。

当您的孩子抑或学生真正成了时间的主人，他们会倍加珍惜。也许他们在反省浪费时间之时，就是学业有成之际。不信的话可以看看下面的例子：达尔文说他贪睡，把时间浪费了，却写了《物种起源》；奥本海默说他锄地拔草，把时间浪费了，后来成为“原子弹之父”；海明威说他钓鱼、打猎，把时间浪费了，终于获得了诺贝尔奖……

请“慎以惜时论短长”，如何？